

全球智库半月谈

零利率之谜：长期均衡还是短期政策所致

TPP 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货币战争、政策协调与资本管制

全球化与两极化——英国脱欧的启示

脱欧对于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南中国海现在将实现和平了吗

本期编译

安婧宜

郭子睿

侯书漪

黄杨荔

刘天培

申劭婧

沈仲凯

伊林甸甸

张麟

张舜栋

朱子阳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侯书漪	科研助理
	安婧宜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侯书漪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零利率之谜：长期均衡还是短期政策所致？ 3

导读：自 2007 年 9 月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及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名义利率已跌至零及以下的短期水平，同时无风险真实利率也降到了零下。这究竟是由市场基本原理决定的长期均衡，还是由一些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短期政策所决定的？对此，支持前者的一派观点认为现下处于长期经济停滞，而这则来自于总需求不足。作者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则支持后者，认为低利率是由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是金融周期中波动的结果。

货币战争、政策协调与资本管制 5

导读：发达国家的强硬货币政策已经遭到新兴经济体的抱怨，导致呼吁协作的声音不断增高。本文对此进行回顾，结论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但通过协调合作的去解决问题的希望并不大，于是资本管制就是削弱影响的自然手段。

全球治理

面对亚洲金融业改革和金融稳定的挑战 7

导读：亚洲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IMF 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次由旧金山联储银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的会议中，IMF 经济学家就全球经济前景、亚洲金融深化和稳定、IMF 在亚洲金融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讲话。

TPP 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10

导读：本文评估了 TPP 对亚太地区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的影响。考虑到 TPP 成员国的大型经济体，TPP 会影响到参与和非参与国家的经济，以及亚太地区的贸易谈话。另外，TPP 有助于 WTO 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的复兴。

脱欧专题

全球化与两极化——英国脱欧的启示 12

导读：近期来一系列关于退出欧盟的讨论使得针对全球化的敌意言论再次甚嚣尘上。本文针对丹麦的案例，对全球化是否会使发达国家的就业产生两极分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全球化固然会通过更激烈的进口竞争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但这也会使得国内所有高工资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

英国脱欧可推动欧洲改革，甚至拯救欧盟 16

导读：长期以来，欧洲经济趋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退出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并激化了各成员国对欧盟的不满。但是，脱欧可能会推动欧洲的改革，甚至会拯救欧盟。未来，一个脱离政治目标的自由贸易组织可能会在欧洲与欧盟共存。

英国脱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18

导读：英国脱欧公投出人意料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美国 2013 年的“缩减购债恐慌”。那么，英国脱欧对新兴市场国家会有类似的效果吗？本文认为，“缩减购债恐慌”或许仅意味着金融市场波动，而英国脱欧则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包容性增长的启示 25

导读：根据作者的回归分析，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除了地理差异、未受教育和年长者占比较高以外，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激励了脱欧票，而移民对公投结果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弱势群体在投票群体中占比较小，年轻人和苏格兰、北爱尔兰及伦敦居民投票参与率也较低，而他们更倾向于留欧。

脱欧对于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30

导读：如果英国无法确保像挪威一样在不具有欧盟完全成员身份的情况下依然能与之自由贸易，而是将商业活动局限在内部市场，就将失去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欧元结算的能力。而这二者都是伦敦作为金融中心最吸引人之处。多数大额银行业务以及交易部门将因此撤出英国。

英国脱欧会影响 TTIP 谈判，但是也有积极影响 33

导读：英国脱欧会放缓跨大西洋贸易协定的进程，但在另一方面，除去了英国的影响，也可能为美国-欧盟的贸易协定谈判带来一些好处。

战略观察**南中国海现在将实现和平了吗？ 35**

导读：2016 年 7 月 14 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南中国海现在将实现和平了吗？》，作者就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之后的亚太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 37

导读：2016 年 4 月 13 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作者对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形势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相关知识。

英国脱欧将会削弱英国应对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的能力 39

导读：2016 年 5 月 16 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英国脱欧将会削弱英国应对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的能力》，本文针对当前出现的英国退出欧盟思潮可能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带来的影响作了明确的分析。

本期智库介绍 41

零利率之谜：长期均衡还是短期政策所致？

Lawrence H. White/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自 2007 年 9 月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及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名义利率已跌至零及以下的短期水平，同时无风险真实利率也降到了零下。这究竟是由市场基本原理决定的长期均衡，还是由一些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短期政策所决定的？对此，支持前者的一派观点认为现下处于长期经济停滞，而这则来自于总需求不足。作者及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则支持后者，认为低利率是由宽松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是金融周期中波动的结果。编译如下：

自 2007 年 9 月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及美国的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名义利率已跌至零及以下的短期水平，同时无风险真实利率也降到了零下。今年 6 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零利率及经济秩序”的研讨会，主题是讨论现下超低的利率究竟是由市场基本原理决定的长期均衡，还是由一些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短期政策所决定的。用 Wicksell 的话来说，即究竟是真实自然利率确实低于零，还是由中央银行控制下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观测到自然利率，需要一些间接的指标。

在 Wicksell 的经典理论分析中，央行可以通过印发货币来使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因为随着货币供给线的右移，可贷资金数量会增加，均衡利率会下降，也即流动性效应。另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增加也提高了市场价格以及名义收入，使得货币需求曲线右移，提高了利率，也即（名义）收入效应。因此，如果央行想要将利率持续控制在自然利率之下，那么它需要加速货币增发。然而在这八年中，我们没有看到货币增长率和通胀率有递增的迹象。换言之，Wicksell 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自 2008 年以来利率水平如此低？

Lukasz Rachel 和 Thomas D Smith 在其英国央行的工作论文中指出：“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共同变动，其背后的驱动力可能是全球真实利率确实已经降低。”他们试图量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影响货币供给曲线右移、需求曲线左移的原因；前者包括退休人口的增加、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提高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预防性储蓄，后者包括投资低迷以及高风险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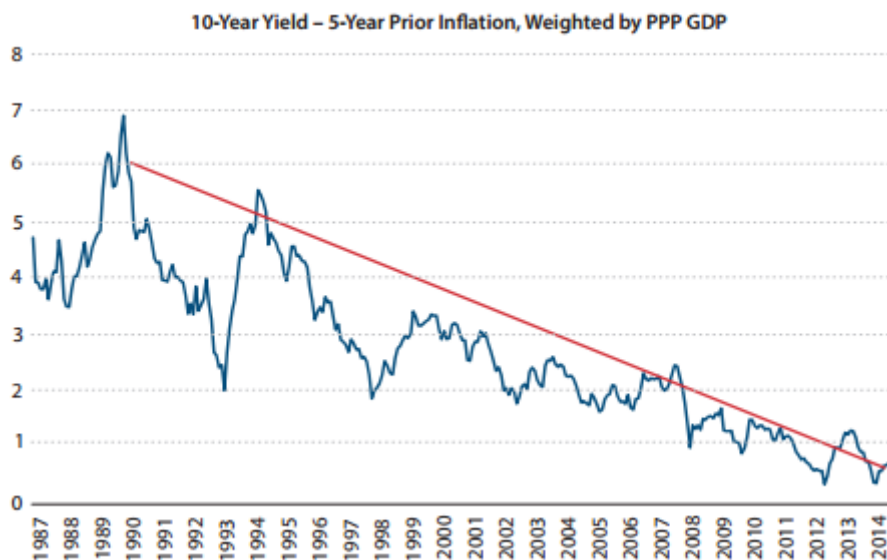
此外，几位参会专家，尤其是 William R. White 和 Andrew Filardo 提出了其他的解释。他们认为，零利率并不是一个长期均衡，而是金融周期中波动的结果。在他们的文章中写道：“无约束的信贷膨胀给之后金融泡沫的破裂留下了巨大的问题，加之过度贷款所导致的投资信心低迷，都削弱了生产率”。与之相反，另一个观点则认为低利率是现实经济长期停滞的结果。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前后因果性，即信贷膨胀先于泡沫破裂。

在长期经济停滞的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减缓主要是因为结构性的总需求不足所致。这种不足先于金融危机，是由一系列深层次因素所决定的，包括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和技术进步。而这所带来的主要现象就是实际利率的下降，以及反通胀压力。这其中的逻辑是：一旦金融膨胀未加控制而最终出错，将造成长期的损害，因为那些金融泡沫掩盖进而也恶化了生产率的下滑。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中，并没有直接责备此前各国央行对信贷的宽松政策。但可以看到，报告认为一个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或许能放缓早期泡沫膨胀的速度。当然，与其说是用货币政策来对抗金融不平衡，在我看来，不如说是通过资产价格或名义 GDP 来衡量货币政策是否过于宽松。与其将实际的决策任务描述为制定准则来帮助央银更有效地应对金融繁荣和萧条，不如说是我们需要指导方针让央行停止继续滋生金融泡沫。因此，BIS 报告之所以支持用名义 GDP 作为央行的目标而非 CPI 或其他价格指数，在于它不需要量宽来抵消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相对价格降低。

可以看到，BIS 报告的观点比之“长期经济停滞”更具解释力，后者将问题归结于长期总需求不足。根据后者的解释，自 2008、2009 年后的七至八年中价格始终没有调整到均衡，这显然与我们一般认识中价格对于名义冲击的调整周期来得长。它不能同时调和实际利率在跨期市场中达到长期均衡，而在现货市场上价格水平始终没能调整到长期均衡水平。

图 1 近十年全球政府债券真实利率



本文原题为“Why Are Interest Rates So Low?”。本文作者 Lawrence H. White 为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ATO）和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CATO 官网。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货币战争、政策协调与资本管制

Olivier Blanchard/文 刘天培/编译

导读:发达国家的强硬货币政策已经遭到新兴经济体的抱怨,导致呼吁协作的声音不断增高。本文对此进行回顾,结论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但通过协调合作的去解决问题的希望并不大,于是资本管制就是削弱影响的自然手段。编译如下:

2010 年巴西财政部长就对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发表不满,随后印度总理也呼应了这个不满。现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货币政策应该协同。但是本文认为协同空间不大,资本管制是缓解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货币政策的跨境溢出效应

首先,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需求增加。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占本国 GDP 的 5%-10%。发达经济体产出增加时,就需要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更多。对于任一个发展中经济体,都会直接受益,同时还会带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对 GDP 弹性在 1.5 到 2 之间,反映了进口的投资份额和长久的投资周期。

其次,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对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升值。这个效应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较为明显。市场风险厌恶水平上升,发达银行撤资,发展中国家资本大量流出,导致本国货币急剧贬值。而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又导致资本回流到发展中经济体。当 2013 年联储宣布降速购买国债,又导致发展中经济体货币贬值。贬值导致出口上升,仍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最后,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系统。也许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最大的抱怨在于大量的资本流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系统稳定性产生冲击。需要注意到一个错觉,尽管发达国家利率较低,肯定导致对发展中国家资产需求上升,但资本流入必须匹配资本流出或者商品流出,只要没有汇率干预。这样一来,发达货币一定也会贬值。尽管有研究提供了支持,但是我们仍旧不清楚这些经济效应发生的渠道和过程。所以之后我也不会讨论这一点。

协调合作的范围

首先需要定义什么是协作。我认为协作应该是一系列使得所有国家变得更好的政策。我的问题是,分散化的均衡是不是一个纳什均衡?

答案不难,只要国家之间没有扭曲性的调整工具,均衡就是有效的。我的模型是一个两国家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国家考虑的是总产出和净出口两个稳定目标。如果两个国家可以同时用货币和财政政策(两个工具),而且它们是非扭曲的,那么它们就是有效的,没有协作空间。实际上,政策制定者还关心预算是否

平衡，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工具三个目标。如果财政政策在模型中不能实施，情况又会如何呢？剩下两个目标和一个工具，那么此时就不再是纳什均衡了。协作也就有了空间，双方的福利都将会提高一点点。在前一部分中，我提到了两种影响渠道，如果第一个渠道的影响力超过第二个，那么在协作均衡下，国内政策的反应将超过对外政策。如果第二个影响力大，则导致对外政策反应更强。

政策制定者如何进一步提高均衡产出呢？需要再加一个工具，即资本控制。背后逻辑很简单，就是当货币政策不仅影响了内需还有汇率时，资本控制可以控制进出口。这条逻辑在自然不过了。

货币政策与外汇管制

如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改变风险升水，那么汇率将会调整到净流入还是为 0 的状态（即无抛补利率平价时的资本流动状态）。但如果风险升水随之改变，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比如，第一轮 QE 时投资者得到了保证，未来美国市场将会正常运转，这样资本就回流美国。但第二轮 QE 时，风险水平没有改变，使得资本向外流出许多。

我们很难从理论上导出一个可信的结论，所以我们讨论一下经验证据。尽管有不少研究，但是结论并不明确。有些研究认为对于某类型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有驱动作用。但如果把流入和流出加总，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Cerutti 等(2015)认为 VIX 增长会减少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尽管系数符号与我们预期相同，但是系数大小很难显著，而且解释力并不强。

那么流入资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影响还有别的渠道吗？至少能想到两个。亚洲金融危机提出了一个，是通过汇率影响金融系统。对于持有外汇的主体来说，外汇贬值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负债表。即便大的金融机构对冲了大部分风险，未对冲的头寸价值也会受到影响。第二个渠道是流入和流出的资本组成发生了改变。假设资本流动的渠道是这样的：国内投资者增持主权债券，国外投资者减持，那么对稳定性影响并不大。如果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渠道改变为：投入国内银行的资金增长，但对主权债券减持。影响就会变得不可估测。总之很难明确货币政策能造成的可预测的影响，但政策制定者将来必须关注这一方面，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资本流动控制。

本文原题为“Currency Wars, Coordination, and Capital Controls”。本文作者 Olivier Blanchard 为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面对亚洲金融业改革和金融稳定的挑战

Mitsuhiro Furusawa/文 朱子阳/编译

导读:亚洲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IMF 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次由旧金山联储银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的会议中,IMF 经济学家就全球经济前景、亚洲金融深化和稳定、IMF 在亚洲金融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讲话。编译如下:

早上好。首先感谢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和新加坡金管局的邀请,参与本次研讨会,并就金融改革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发言。

就这一主题交换意见对亚洲是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正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几周前英国公投产生的脱欧决议。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对亚洲的理解。这一议题是一些政策制定者,监管者,投资者和公司高管所面临的核心经济问题。

亚太地区成功抵御了近期的金融动荡,部分原因包括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和强大的储备头寸。该地区还实施了促进金融稳定的措施,如加强银行资本流动性并在巴塞尔协议 III 框架下逐步进行改革。这些改革,以帮助金融机构变得更加有弹性,并建立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他们最终帮助确保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因此,我今天想谈一谈全球经济前景、金融机构与金融稳定以及 IMF 的作用。

全球经济前景

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发达经济体正以适度的速度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则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做着最重要的贡献。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世界贸易减速,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市场波动、过度规避风险、信贷条件紧缩等问题。

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它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尤其是中国的影响较大。而东盟国家相对强劲的势头,随着国内需求帮助抵消出口放缓。中国的经济再平衡的结果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之一。

第二个风险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亚太地区的贸易和金融对投资者情绪的周期性变化特别敏感。急剧下降的商品价格和出口的速度较慢加剧了整个新兴市场波动。亚太国家中,私营部门和家庭的杠杆持续加大。

与此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还本付息能力脆弱。再融资压力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在一般商品出口国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情况受到利差扩大和资本外流而加剧。

企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在中国。去年，当中国股市遭遇动荡。债务比例上升使得中国企业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其利息。最新的 IMF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估计，“债务风险”已经从 2010 年的 4% 上升到了上市中国企业债务的 14%，同比大幅增长。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如果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金融稳定

到目前为止，亚洲已经表明它能够适应风险。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都保持漏洞检查，并加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公司债已从高杠杆率和汇率风险中吸取了很多教训。

但确保金融稳定要求我们不留任何自满的余地。现在亚洲应该落实其弹性和金融稳定的承诺。国家和企业需要为市场情绪和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做好准备。

金融部门深化改革

金融深化改革意味着金融部门应当超越传统的银行业务，为消费者和企业创造金融产品和机会，这可以提升生产力可持续增长。跨越国界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可以创造新的贸易联系，加强在服务业的协同效应，并改变资本市场。

融资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基础设施项目，政府应当鼓励从所有可能的渠道，包括国际国内、公私伙伴关系等，并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内进行。这可以使本币债券市场正常发展，避免外币借款的过度依赖。

更深层次的市场也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扩大金融服务，例如针对百万计的南亚和东盟国家人口，特别是妇女，进行金融产品设计。通过给每个人赋予在经济中的股份，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还有例如伊斯兰金融、小额贷款、包括手机银行的金融技术。

这样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创新必须齐头并进，并防止无休止的承诺，并投入到位的宏观和微观审慎措施，以解决持续的信贷增长。还要建设一个透明度的金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IMF 可以提供什么去协助所有这些努力呢？我们已经像一位家庭医生一样提供咨询意见，并通过我们的报告和分析，从而提出建议。我们的金融部门评估各国的漏洞，并提供方法来加强金融部门监督和发展。

此外，我们可以鼓励成员国政府在关键问题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对话。我们的技术援助和培训方案可以满足各成员国的具体需求。

IMF 还与国际社会合作，以加强对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防御。亚洲已经拥有了清迈倡议（并在最近得到强化），这是对 IMF 努力的重要补充。

此外，我们也扩大了我们的工具包，提供更多、更灵活的融资便利。我们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加强全球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但是，像任何有能力的家庭医生，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之下。保持警惕和进行改革，这也是我们的义务。

结论

所有这些共同的努力需要漫长的道路。要完全规避金融风险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即使是运行最良好的经济体，要独善其身也很困难。但是建立适当的政策框架，并防范冲击则是完全可行的。

亚洲不能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必须查找突出的漏洞，并预判风险。IMF 的职责就是协助这方面的努力，深化、捍卫金融部门。我们将与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成员国进行合作，以确保可能的最佳结果。

本文原题为“The Challenges of Financial Reform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sia”。作者 Mitsuhiro Furusawa 是 IMF 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TPP 对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Jeffrey J. Schott, Cathleen Cimino-Isaacs, 和 Euijin Jung/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评估了 TPP 对亚太地区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的影响。考虑到 TPP 成员国的大型经济体，TPP 会影响到参与和非参与国家的经济，以及亚太地区的贸易谈话。另外，TPP 有助于 WTO 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的复兴。编译如下：

美国和 11 个亚太国家在 2016 年 2 月签订 TPP，这是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最全面的贸易协议。TPP 成员国的产出占全球的 1/3，随着新成员的加入，TPP 的规模和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TPP 能否深化区域和全球更广泛的自由化，依赖于 TPP 非成员国的行动。亚洲贸易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韩国，以及整个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拉丁美洲都不是 TPP 最原始的成员国。从整个世界来看，TPP 并不会带来贸易分化，但是是一些亚洲国家可能会遭受收入损失。关键的担忧在于投资分化，投资者会重新定位 TPP 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 TPP 在未来正式生效，很多亚太区域的国家会重新评估 TPP 利弊。一些国家已经打算加入 TPP，但是这些国家也质疑像 TPP 这样的协议是否会破坏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如果 TPP 的改革能够通过亚太自由贸易区提出更广泛的区域和多边协议来推进，那么将有助于消除这些担忧。

TPP 最显著的近期影响是塑造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并促进经济贸易改革。众多区域贸易协议已经构成贸易协议网络，但有时这些协议的标准和规则也会矛盾。TPP 有助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升级，深化贸易改革，减少贸易协议之间的摩擦。可以肯定的是，全球贸易体系完全一体化还没有形成。另外，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没有具有针对性的市场准入条件，TPP 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关税表。但整体上 TPP 为世界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设定了标准。

TPP 的结论也会影响正在谈判的区域贸易体制。TPP 对当前的区域自由化努力像 RECP 和中日韩贸易谈话既是一种补充，也会为其提供了谈判动力。TPP 会鼓励非 TPP 成员国在这些贸易协议中做出更大的进步。但是，TPP 可能会对当前的区域贸易协议带来风险。一些亚太地区的国家加入了 TPP，还有一些国家并不打算加入 TPP，这会给这些国家之间带来分歧和裂痕。因此它有可能扰乱正在进行的东亚十国一体化努力。

更广泛的，TPP 的创新会促进 WTO 未来协议的升级。TPP 的规则解决了全球供应链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新挑战。事实上，TPP 在数字贸易，国有企业改革等领域的规则会影响未来 WTO 贸易谈判的任务。TPP 在劳工方面的标准，同样也很重要，但是 WTO 议程并没有考虑这些议题。

整体上，TPP 对世界贸易体制最大的影响是鼓励“竞争性自由化”——促进 TPP 成员国改革，鼓励那些还没有加入 TPP 的国家通过双边和区域贸易协议去除贸易和投资障碍。事实上，如果足够多的国家愿意进一步开放，这会引起 WTO 多边贸易谈判的兴起。不幸的是，这一场景还很遥远。WTO 最近只制定了贸易促进条款，这一条款也是三年前成立的，但还没有被所有的成员国批准实施。如果 TPP 能够激起新的议题并为 WTO 未来的谈话指明方向，那么它将会对世界贸易体制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原题为“[Implication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or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本文作者 Jeffrey J. Schott 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Cathleen Cimino-Isaacs 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助理；Euijin Jung 是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分析师。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化与两极化——英国脱欧的启示

Wolfgang Keller, Håle Utar /文 张舜栋/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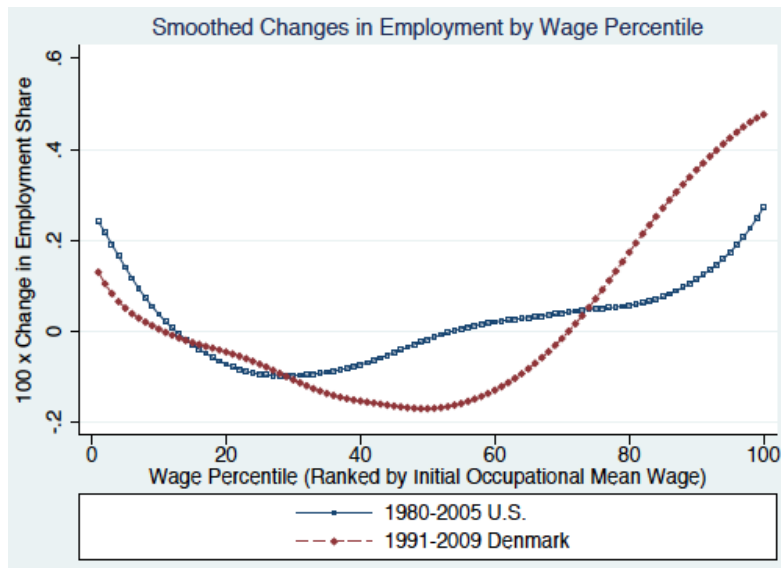
导读：近期来一系列关于退出欧盟的讨论使得针对全球化的敌意言论再次甚嚣尘上。本文针对丹麦的案例，对全球化是否会使发达国家的就业产生两极分化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全球化固然会通过更激烈的进口竞争使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但这也会使得国内所有高工资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编译如下：

在英国退欧公投结果公布当天，前首相布莱尔分析指出，公投通过的关键在于用对全球化的敌视情绪同时团结极左翼和极右翼投票者。然而，读者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伴随着全球化产生的发达国家内中产阶级的快速衰退，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迅速增加才是投票者希望英国退欧的刺激因素。但是，全球化真的是两极分化的原因吗？

研究指出，就业的两极化——即中等收入工作的快速减少，以及低收入、高收入工作的大量增加，在近年来已经是发达国家内的普遍现象了。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发现，他们的贸易伙伴此时经济状况却在一路高歌猛进，如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诚然，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导致的就业和收入下降对于福利国家而言可能是一大挑战，但如果没有与这些损失相对应的受益者，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两极化”，也不会对社会运转造成根本性的威胁。迄今为止研究者们认为，就业的两极化根本原因还是机械和工业机器人大量替代了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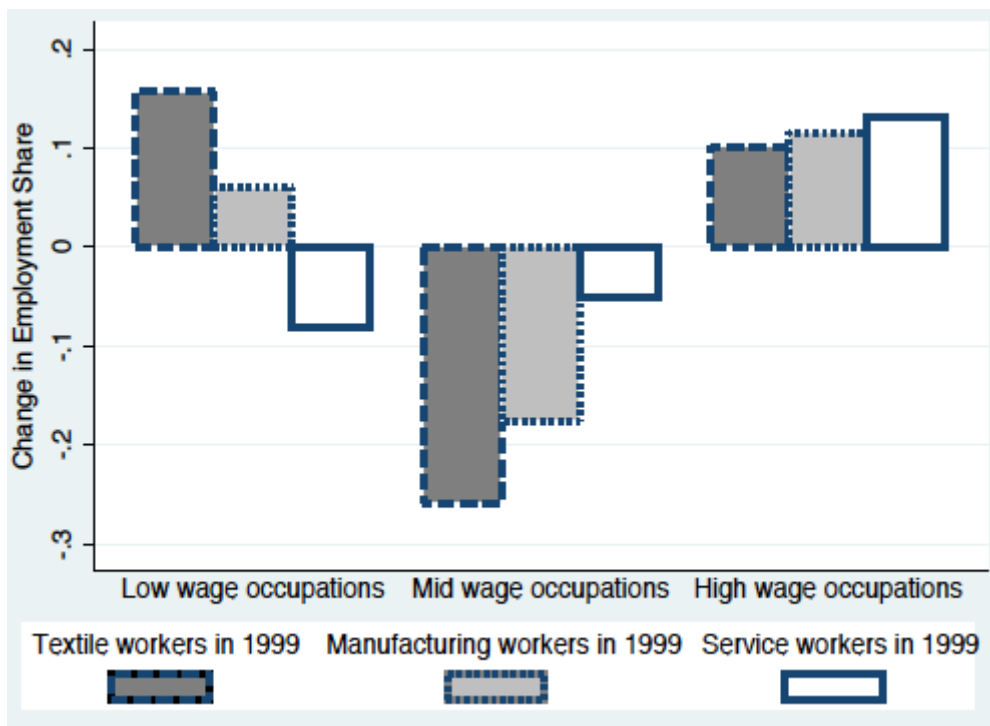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在最近的论文中(Keller and Utar 2016)，通过使用公司提供的员工数据进行研究，并指出进口竞争（通过拥有顶尖技能的劳动者选择提高还是降低自己的行业层级）是在丹麦出现的就业分化现象的主要因素。丹麦的案例之所以有趣，不仅是因为其就业两极化与全球化的步伐有相当的代表性（见图 1 与美国的对比），也是因为丹麦被认为是最有可能下一个退出欧盟的国家之一。

图 1 丹麦的就业两极化进程



我们研究的亮点之一，是我们追踪了几乎一百万丹麦劳动者的就业历史，从最初的行业一直到其最终所在的行业。图 2 展示了 2000 到 2009 年间纺织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与 1999 年的相对变化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制造业的就业分化轨迹非常明显，而相比之下服务业则恰恰相反，存在着一种“技能升级”或是“向上移动”的特征。这可能是由于进口竞争对制造业意味着更为直接的冲击，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也可以对贸易的重要性有初步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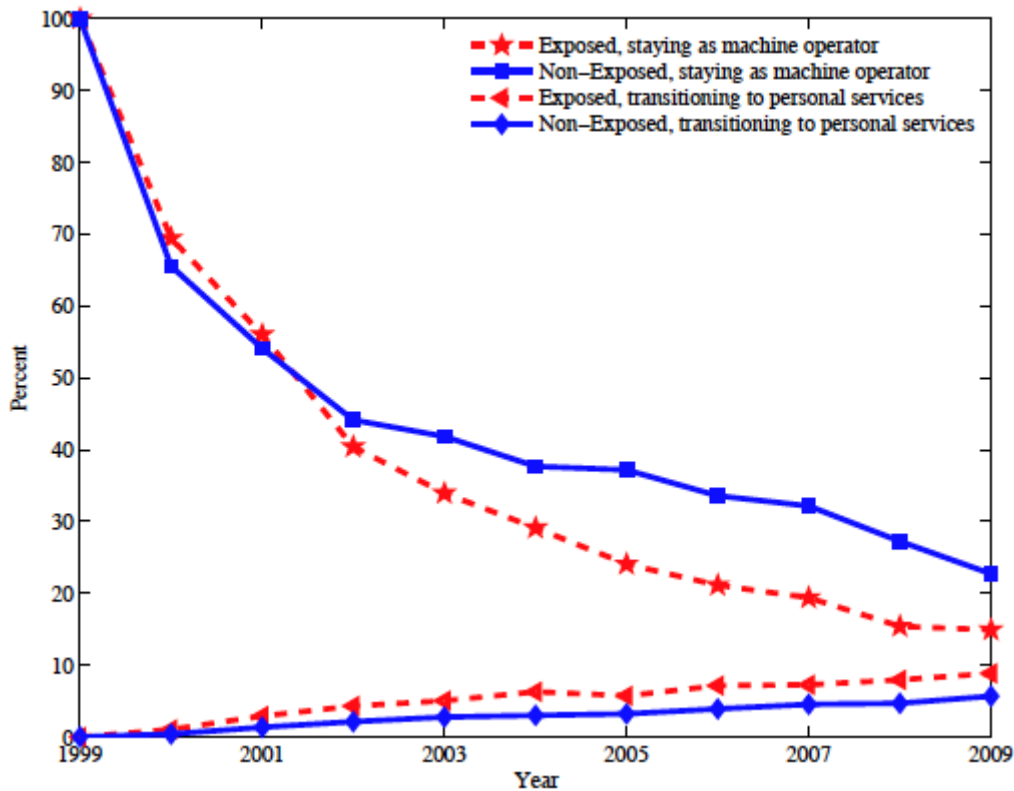
图 2 2000 到 2009 年间不同行业就业比例与 1999 年的对比情况



通常，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最显著的冲击因素之一。这对于劳动密集的纺织和服装业而言尤为如此。随着中国加入 WTO，在贸易自由化

的大潮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大大发挥了出来。图 3 展示了丹麦境内纺织机操作员的人数比例变化图，这一职业的就业者通常属于中等收入的工人。

图 3 丹麦纺织机操作员的职业变化轨迹



首先，图中上方的两条折线向我们展示了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当中，在经历了（虚线）/未经历（实线）进口竞争冲击后的纺织机操作工累积就业概率。两条线的趋势都是向下的，意味着在 1999 年还从事纺织机操作的工人都在 21 世纪时转换了就业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受进口竞争冲击的企业，其雇佣的纺织机操作员在 2009 年依然从事这一行业的概率是 23%，而相应的受冲击企业则为 15%，这其中 8% 的差值就是进口冲击对中等收入职业的负面作用的典型体现。

另外，图中较低的两条线则向我们展示了原先从事纺织机操作的工人转而投向受到保护的服务业，如旅游中介、保姆、护工等，的累积就业概率。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进口竞争带来的冲击，原先从事中等收入行业的工人不成比例地转向了受到保护的低收入行业。

我们使用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了这些结论是否对一国内的经济整体同样成立，我们得出结论，进口竞争的冲击可以解释丹麦国内中等收入职位 20% 的降低，同样也可以解释很大一部分低收入职位的增加。因此，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很明显是丹麦国内就业两极化的重要原因。

另外我们还看到，技术进步和离岸外包的普及都是导致丹麦就业两极化的因素。不过与进口竞争相比，这两个因素的作用方向不尽相同。离岸外包会使得中等收入的劳动者倾向于转而从事更低收入的工作，而技术进步则恰恰相反。

尽管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丹麦还属于较为平等的国家，但近年来丹麦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有所加剧。基于统计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 1999 到 2009 年间丹麦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长当中有 16% 是由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所导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业结构的变化，而非小时工资的变化所引起的。中等收入职业的减少伴随着低收入和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增加，其中，低收入行业增加主要在服务业，而高收入的增加则集中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由于丹麦国内制造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低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制造业当中并没有出现分化的现象。

总之，我们发现全球化的效应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冲击确实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就业的两极化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强，以及高收入行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因此，在面临以后的退欧讨论时，各国的决策者们有必要向公众充分说明全球化带来的益处。

本文原题为“Globalisation and polarisation in the wake of Brexit”。本文作者 Wolfgang Keller 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经济学教授，Håle Utar 为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可推动欧洲改革，甚至拯救欧盟

John Gillingham and Marian L. Tupy / 文 安靖宜 / 编译

导读：长期以来，欧洲经济趋于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退出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并激化了各成员国对欧盟的不满。但是，脱欧可能会推动欧洲的改革，甚至会拯救欧盟。未来，一个脱离政治目标的自由贸易组织可能会在欧洲与欧盟共存。编译如下：

如今，世界已从英国脱欧后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曾经困惑的欧洲公众也有望看到遥远的光明。这光明可能会熄灭，但也可能照亮黑暗中的欧洲大陆。

关于未来的预言并非全部悲观，英国托利派可能会重塑他们的政治议程。在此过程中，他们无需对自由派的无序抗议太过担心。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鼓励欧盟共同面对现实，避免互相指责。就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英国似乎并未被排在末尾，而是被优先考虑。大多数欧盟成员都对德国统治和俄罗斯复兴怀有恐惧，所以他们希望英国和美国继续参与到欧洲事务中来。

各国精英也认同，当务之急是维系统一市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政党也持此观点。只有英国在统一市场中的成员资格被确定，棘手但仍可解决的移民问题就才可能尘埃落定。比如，列支敦士登共和国虽然可以参与统一市场，但对人民行为的规范权力却很弱。这一情况可能会成为英国的未来吗？

英国全民公投揭示了公众对欧盟影响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深刻不满。近期的投票显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欧盟机构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反对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形式，但其普遍诉求都是反对不负责任、无竞争力的技术统治。即便是欧盟的温和派政党，都在脱欧后开始认识到欧盟有多么不受欢迎。

就像那些支持英国第二次公投的留欧派们一样，那些支持更加紧密联合的顽固派们仍固执己见，但他们的观点渐渐被排除在主流观点之外了。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下台的呼声不绝于耳，法国共和党前主席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甚至支持彻底废除欧盟委员会。

面对加盟国的公投呼声，欧盟的官员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却因此被视为死板。对此，欧盟提倡团结，惩罚英国，并以此威慑其他不满的国家。团结呼声之下，是欧盟深深的恐惧。欧盟恐惧英国将会成功，而西方文明不会坍塌，这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多纳尔德·图斯克的论断格格不入。

顽固派难以阻挠英国的行动，英国政府已经拒绝直接按照第五十条款(Article 50)的时间表脱欧，而欧盟本身对此条款规定的脱欧日程也存在严重分歧。延迟脱欧可以增强英国的谈判力，却会削弱欧洲的力量。

未来，作为非欧盟国家与欧盟国家进行无歧视贸易基础的“统一护照”将被废除，欧洲的金融结构将会摇摇欲坠。比如，意大利银行业将要指望英国的金融帮助才能避免破产。

欧洲有着长期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和止步不前的经济，无法承担与英国的互利贸易关系破裂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强硬的言论不意味着同样强硬的行动。

英国长期面临的结构问题将会持续，甚至会因欧盟的不当决策引起的爱国主义潮流而激化。欧盟的二十八个成员国不会赞同它的规划，正如人们不会购买一艘逐渐下沉航船的船票。

当然了，更好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如果英国重新负担起她 42 年前卸下的重担，重新规划欧洲自由贸易，那么欧盟也可能得救。加入此类贸易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北欧，瑞士和保加利亚都一度这样做过。

未来，一个欧洲国家间的自由贸易组织可能出现。它将避免共同政治目标，从而允许成员国各自以最好的方式管理国内事务，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它可以与欧盟这样拥有超国家政治力量和共同货币的组织共存。

此时此刻，英国提出新欧洲的构想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静待机会则是更明智的选择。经历着政治混乱和经济低迷，欧洲终会踏入自由贸易时代。而英国，则可以采用更加巧妙的手段。

本文原题为“Brexit Can Reform Europe and Perhaps Even Save the EU”。本文作者 John R. Gillingham 为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历史教授，Marian L. Tupy 为 Cato 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员。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Cato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Barry Eichengreen, Poonam Gupta, Anderson Ospino /文 伊林甸甸/编译

导读:英国脱欧公投出人意料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美国 2013 年的“缩减购债恐慌”。那么,英国脱欧对新兴市场国家会有类似的效果吗?本文认为,“缩减购债恐慌”或许仅意味着金融市场波动,而英国脱欧则有更为深远的影响。编译如下:

在讨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时,英国脱欧的效果常被人与 2013 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推行的“缩减购债恐慌”政策相比较。本文中,我们主要探讨英国脱欧是否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类似的效果。

直觉上来看确实如此。英国脱欧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和汇率都经历下跌。如果说与美国 2013 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下跌的范围和幅度都更严重。

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思考,答案其实是否定的。“缩减购债恐慌”主要影响那些有大量资本流入且证券市场流动性较好的国家,而英国脱欧主要打击与欧盟和英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这与人们的认识恰恰相反,不久前某著名国际银行还宣称“现在讨论英国脱欧的外贸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英国与大多数欧盟国家的贸易往来还是相对脆弱的。”

我们更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与“缩减购债恐慌”相比,英国脱欧将通过贸易渠道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冲击。我们的分析显示,新兴市场国家证券与外汇市场受英国脱欧的冲击要比“缩减购债恐慌”的影响更大(见表 1、2)。

表 1 新兴市场在英国脱欧后的表现

	Day 1	Day 2	Cumulative impact 2 day impact
Exchange Rates Against the US \$)			
Fraction of Countries in which Exchange Rate Depreciated	43/50	4/50	43/50
Mean Depreciation	1.25	0.07	1.32
Median Depreciation	1.03	0.00	1.13
Stock Market Indices (in Domestic Currency)			
Fraction of Countries in which Stock Market Index Declined	37/42	35/42	40/42
Mean Decline (%)	-1.54	-1.55	-3.10
Median Decline (%)	-1.39	-1.12	-2.68

表 2 新兴市场在“缩减购债恐慌”后的表现

	Day 1	Day 2	Cumulative impact 2 day impact
Exchange Rates			
Fraction of Countries in which Exchange Rate Depreciated	29/50	14/50	31/50
Mean Depreciation	0.20	-0.04	0.16
Median Depreciation	0.05	0.00	0.09
Stock Market Indices			
Fraction of Countries in which Stock Market Index Declined	30/42	14/42	25/42
Mean Decline (%)	-0.78	0.20	-0.57
Median Decline (%)	-0.65	0.03	-0.5

注：数据引自 DataStream，证券市场以本国货币计算，汇率以对美元汇率计算，下同。

而新兴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也显示，英国脱欧的冲击效果对不同国家不一样（见图 1）。英国脱欧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由正到-9%的波动，外汇市场则出现从 0%到 4.5%的贬值。此外，证券市场与外汇市场的波动也是正向相关的，证券市场下跌最严重的国家，外汇市场也经历了最严重的贬值。

图 1 英国脱欧两天后证券市场的波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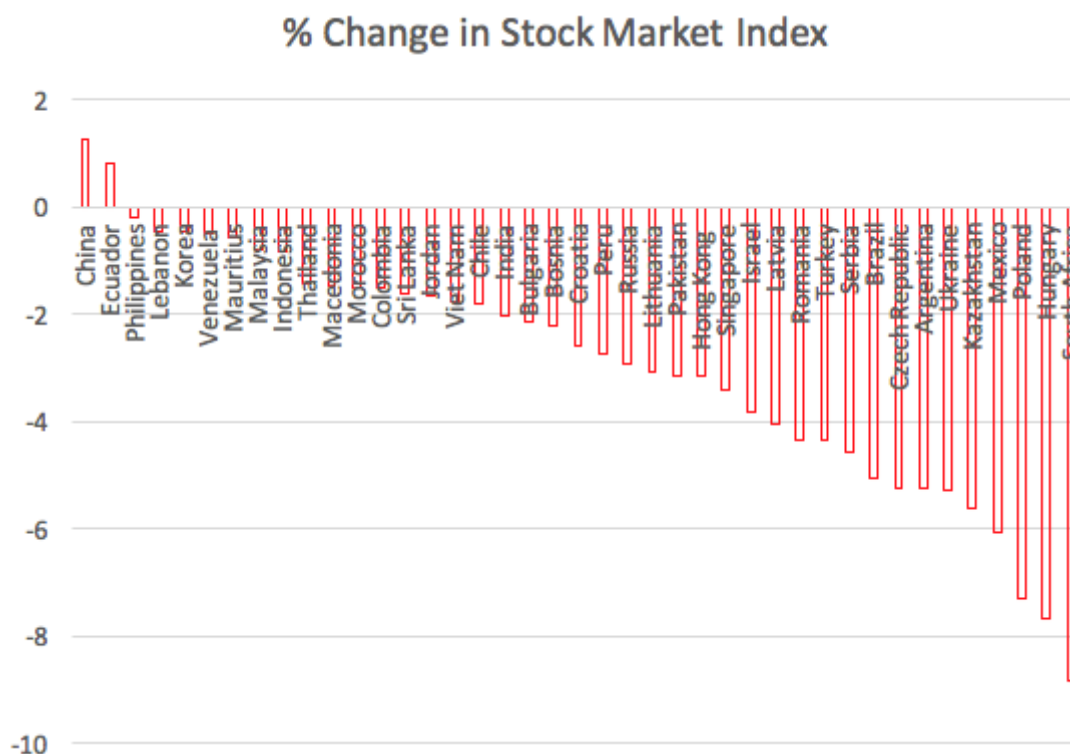


图 2 英国脱欧两天后外汇市场的波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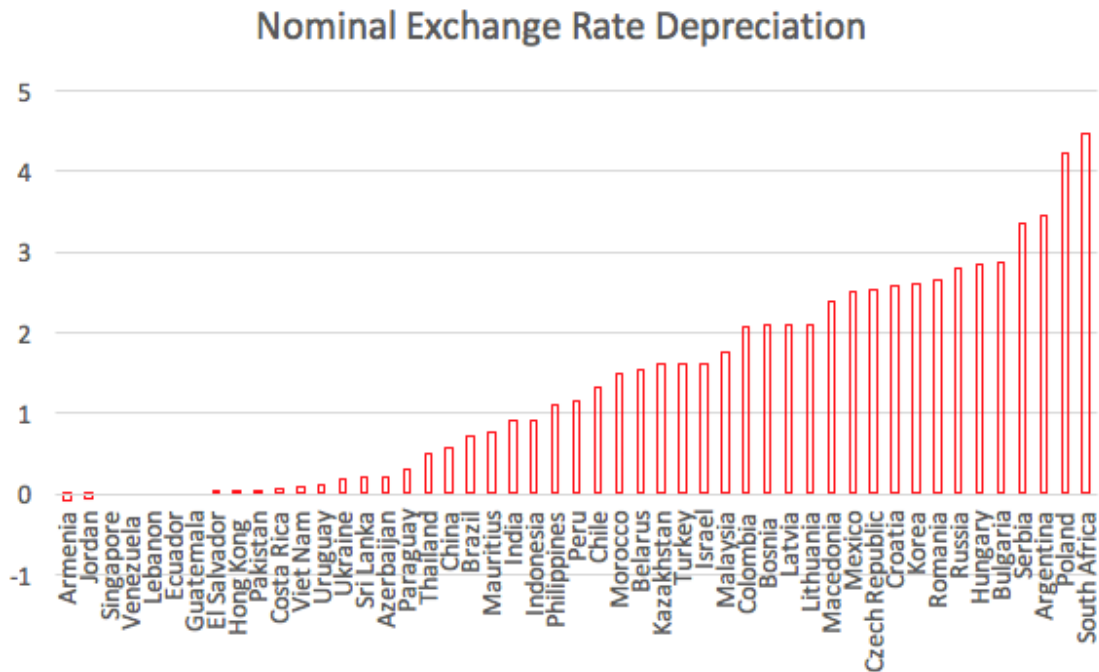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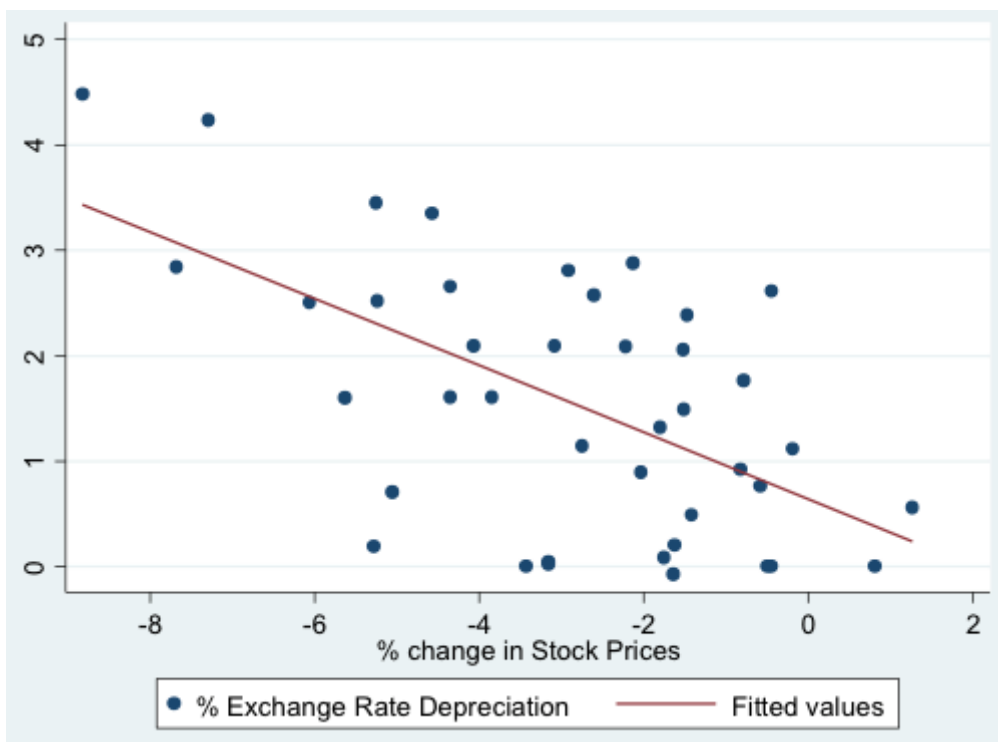


图 3 英国脱欧两天后证券与外汇市场波动的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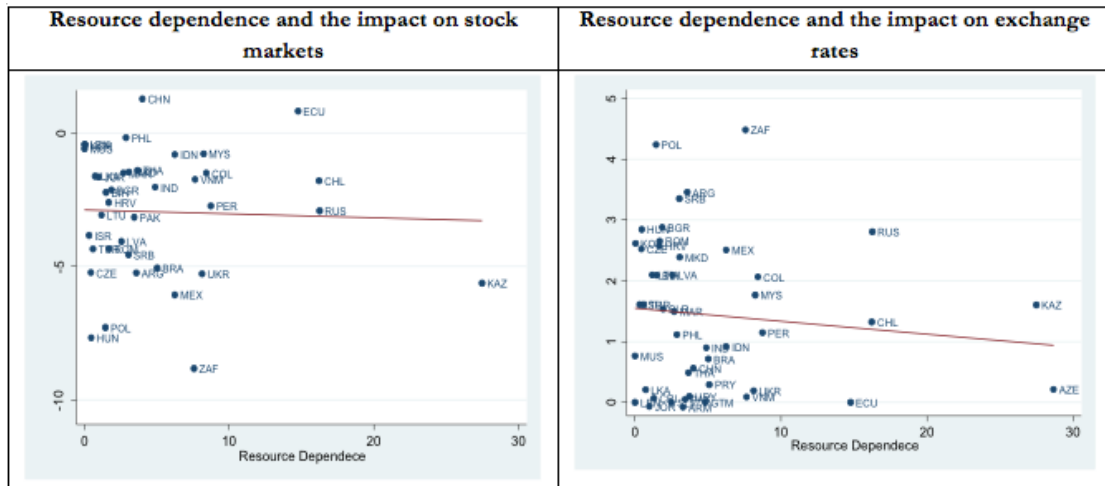


注：数据来自 DataStream。

那么，是哪个变量导致外汇与证券市场同步变动呢？经济增长前景较差的国家是否经历了更严重的贬值和股价下跌呢？我们使用世界银行的报告，研究了每个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英国脱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英国脱欧伴随着全球油价的下跌，英国脱欧是否对资源依赖型国家影响更大呢？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资源依赖型国家并没有对英国脱欧做出更明显的反应。

图 4 资源依赖程度与英国脱欧的冲击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欧盟内的新兴国家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在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波黑、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立陶宛、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等国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英国脱欧对上述国家证券市场的平均影响是-4.1%，平均汇率贬值幅度则是-2.4%。这些结果在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依然显著（见表 3、4）。

此外，英国脱欧是否对那些与英国/欧盟国家经贸往来更频繁的国家冲击更大？我们计算了各国 GDP 中对英国/欧洲外贸占比，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猜测。

图 5 英国脱欧对中欧/东欧/南欧（CESEE）国家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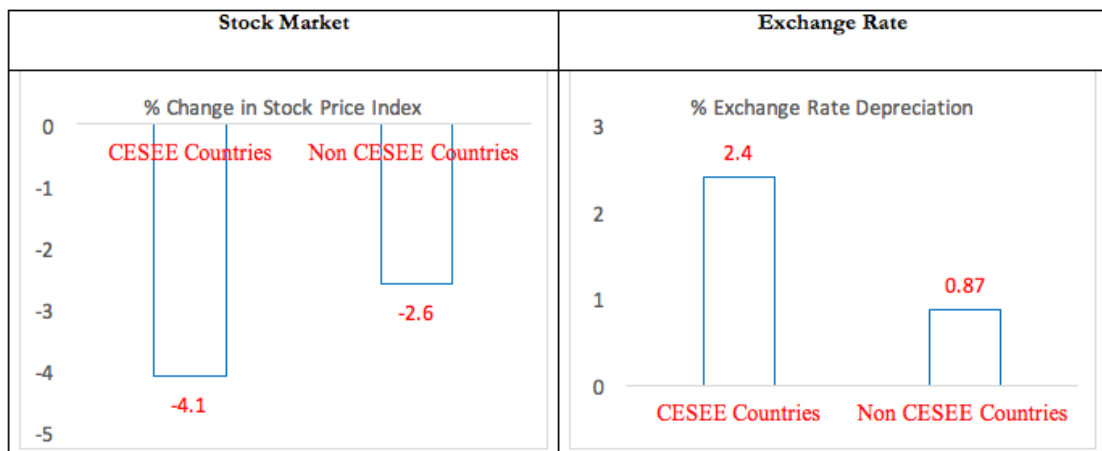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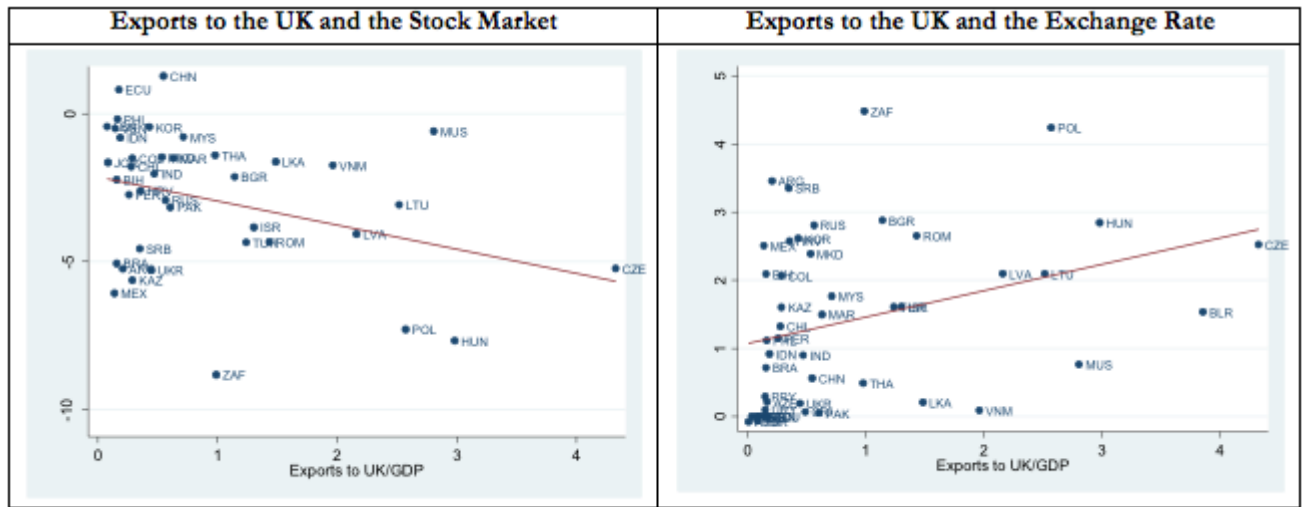


图 6 与英国的贸易



注：数据来自 IMF 贸易统计。所有相关关系都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有趣的是，与欧盟的贸易比与英国的贸易影响更大。当回归中包含两者时，与欧盟的贸易一项系数显著。显然，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对欧洲经济前景的恐慌与对英国差不多。对于 CESEE 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来说，从规模上看，欧盟市场比英国重要得多。即使欧盟发展减缓或衰退，其影响相较英国仍然更为显著。很明显，投资者们预期退欧事件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影响仍然会比较大。

图 7 与英国和欧盟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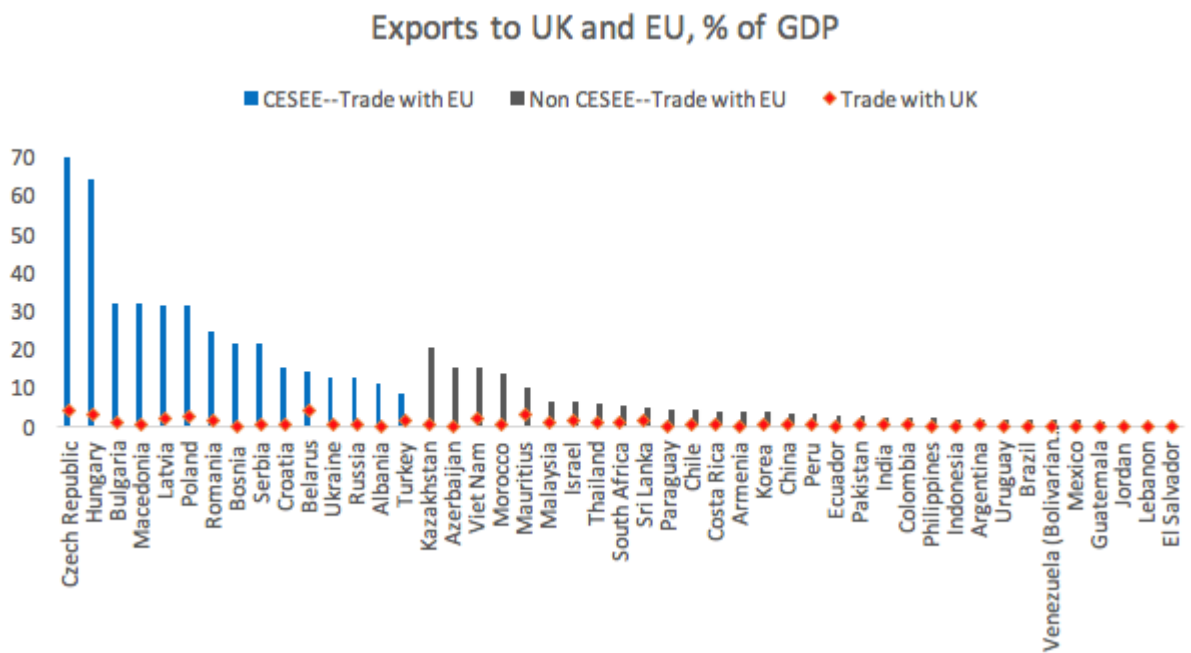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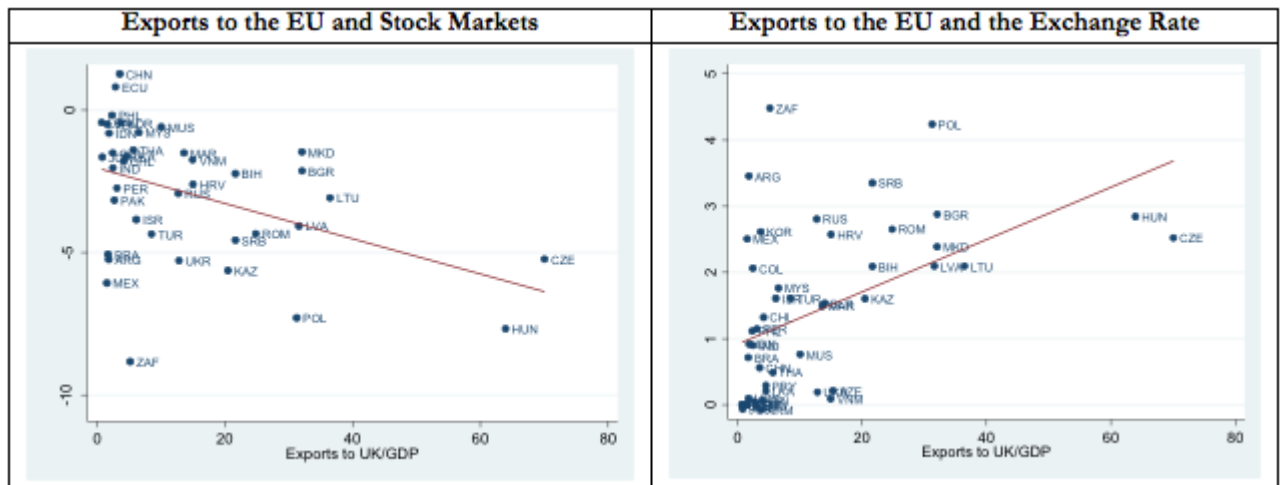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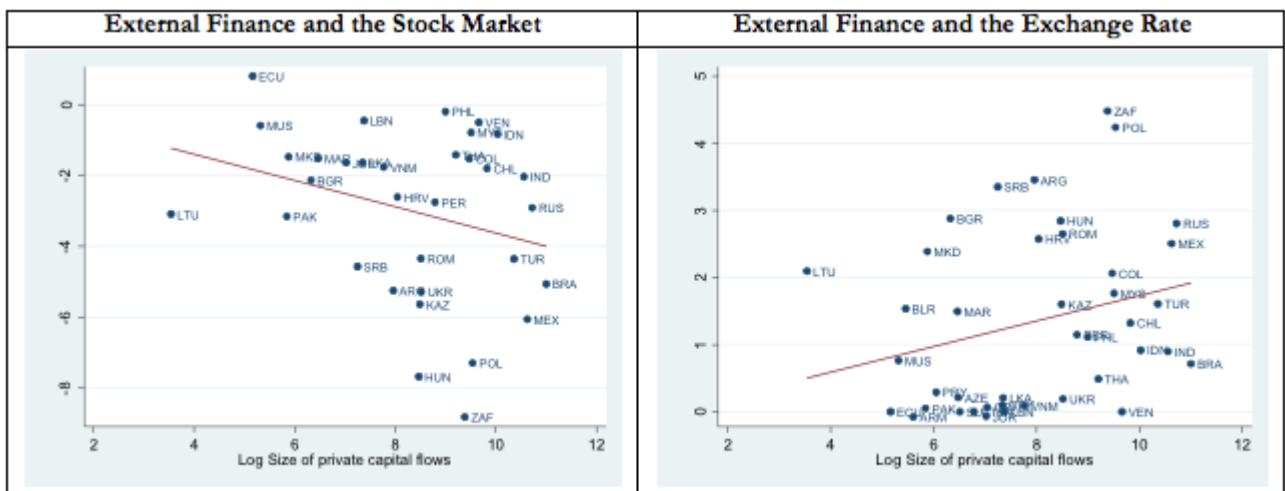
图 8 与欧盟的贸易



注：数据来自 IMF 贸易统计。所有相关关系都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最后，资本流入更多的新兴市场或是更大的金融市场是否受到更大影响？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相关证据，尽管这比我们早先分析“缩减购债恐慌”的结果更弱。

图 9 私人外部融资



注：私人外部融资包括 2012 至 2014 年间收到的贷款、债券和股票。数据来自 IMF2015 年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艾肯格林（Eichengreen）和古普塔（Gupta）（2014）认为这是对金融市场规模的代理。以上两面板中系数均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出口水平——到欧盟而并非仅仅英国——一贯有助于解释新兴市场对于英国脱欧的负面反应。对于汇率下降，中欧及东欧国家的虚拟变量持续起解释作用，正如对欧盟和英国发展前景除了出口之外的新质疑声显得纯粹而简单。另外，根据前期资本流入或外部负债存量衡量的外部金融风险也解释了新

兴股票市场 and 外汇市场下滑最明显的原因，尽管这些结果比我们早先分析“缩减购债恐慌”的结果更弱。

结论

从股票和外汇市场来看，新兴市场受到了英国脱欧的强烈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实际上比“削减恐慌”时期更加强烈而广泛。“缩减购债恐慌”普遍被认为是典型的新兴市场冲击，更准确地说，典型的冲击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的时期。

英国脱欧的短期金融冲击不仅由新兴市场的股票和外汇市场见证，诸如 VIX 等全球性风险规避指标也有所反应。新兴市场中，主要出口欧盟市场的国家受影响最为严重。“缩减购债恐慌”主要表现为金融冲击（它提出了有关美元融资的条款和可行性问题），而英国脱欧显然被认为具有实体和金融双重影响，这违背了早期投资银行和财务顾问之间的共识。然而这个故事还远未结束，敬请关注。

本文原题为“The Brexit Surprise and emerging markets”。本文作者 Barry Eichengreen, 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Poonam Gupta, 和 Anderson Ospino 为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对包容性增长的启示

ZSOLT DARVAS/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根据作者的回归分析，在英国脱欧公投中，除了地理差异、未受教育和年长者占比较高以外，收入不平等和贫困激励了脱欧票，而移民对公投结果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弱势群体在投票群体中占比较小，年轻人和苏格兰、北爱尔兰及伦敦居民投票参与率也较低，而他们更倾向于留欧。编译如下：

收入不平等、贫困和失业是否在英国脱欧公投中加剧了脱欧情绪？本文试图通过计量回归加以考察。民意调查和选举后分析显示，受教育程度低者和穷人倾向于脱欧。地理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地区脱欧比率达 55.5%，威尔士达 52.5%，但在北爱尔兰仅为 44.2%，伦敦为 40.1%，苏格兰为 38.0%。虽然移民是脱欧辩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 Emmanuel Mourlon-Druol 指出，移民和脱欧选票占比之间不存在自发的相关性。

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可以提供有用的见解，但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由第三个变量引起，即便零相关也无法排除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各项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因而相关系数往往难以解释。例如，年轻人通常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年长者通常更加富裕。若要评估影响脱欧票的因素，则需同时考虑多种变量，并对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加以评估。

因此，我采用回归分析。考虑年龄、教育、收入、移民和地理因素后，我着重分析三个社会指标的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贫困和失业。我没有使用民意调查数据，因为它通常存在抽样偏差。我采用英国统计部门公布的社会经济数据。最近一次民调结果显示，年轻人的投票参与率几乎是公投后第一次民调的两倍，而我使用的数据排除了取样导致的不确定性。

回归

我估计了两种类型的回归：一个旨在揭示脱欧票份额的决定因素，另一个意在探索投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在回归中，我还对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构造了虚拟变量，因为投票行为存在明显地理差异。此外，伦敦有别于英国其他地区：相比英国其他地区，伦敦的可支配收入高出两倍多，获大学学位者在人群中占比也几乎是两倍，移民比例近四倍。

脱欧票的决定因素

我想把年轻人（20-34 岁）和老人（65 岁及以上）在居住人口中占比纳入回归，但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因而不宜同时加入。类似的，拥有学位者在人群中占比与无学位者占比也高度相关，因此我估计了四个版本的回归方程（见表 1）。

表 1：对脱欧票决定因素的回归估计

	Model A	Model B	Model C	Model D
Share of population aged 20-34	-0.49 [-4.0]	-0.95 [-6.6]		
Share of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0.45 [3.2]	0.69 [3.7]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 a degree	-0.97 [-11.9]		-1.05 [-13.5]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out qualification		0.58 [4.9]		0.64 [5.0]
Disposable income per inhabitant	0.04 [1.9]	-0.08 [-3.2]	0.05 [2.0]	-0.09 [-3.3]
Gini coeffici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0.77 [2.6]	0.89 [2.4]	0.93 [3.1]	1.24 [3.1]
Poverty rate	1.00 [3.0]	0.85 [1.9]	1.06 [3.1]	0.95 [2.0]
Unemployment rate	-0.14 [-0.7]	-0.06 [-0.2]	-0.34 [-1.7]	-0.48 [-1.6]
Share of non-UK born population	-0.02 [-0.3]	0.01 [0.1]	-0.05 [-0.6]	-0.12 [-1.2]
Scotland	-19.64 [-17.9]	-19.99 [-14.2]	-19.92 [-18]	-20.73 [-13.7]
Northern Ireland	-14.61 [-6.5]	-17.15 [-6.0]	-14.13 [-6.1]	-17.38 [-5.5]
Wales	-5.30 [-3.9]	-6.82 [-3.9]	-6.00 [-4.3]	-8.39 [-4.5]
London	-8.84 [-2.9]	-11.71 [-3.0]	-9.27 [-3.0]	-12.78 [-3.1]
R2	0.85	0.76	0.85	0.72

来源：作者计算。

表 1 得出如下结论：

- 对年轻人占比的估计参数为负，意味着年轻人占比越高脱欧票比例越低。在第一个模型中，该参数的点估计是-0.5，意味着年轻人占比每上升 1%，脱欧票占比就降低 0.5%。相反，老年人占比的估计参数为正，显示老年人倾向于脱欧。
- 拥有学位的劳动力占比是留欧的重要因素，无学位者更倾向于脱欧。值得注意的是，年轻人占比与有学位者占比正相关，最可能的原因是大学毕业生数量随时间推移增加，而老年人在其年轻时获得学位的机会更少。然而回归结果表明，年轻人占比和受良好教育者占比都对结果存在显著影响。
-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具有统计上稳健的影响。在估计只包含四个区域的虚拟变量（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和可支配收入的简单模型时，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参数是-0.13，表明贫困地区的人们倾向于脱欧。然而，表 1 报告的四个回归模型中，可支配收入参数的符号变化，表明其并非脱欧的稳健决定因素。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与拥有学位者占比高度正相关、与无学位者占比高度负相关，而受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收入更

高。然而，当教育和收入都包括在回归中时，教育在统计上显著，但收入没有。

- 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估计参数为正且统计显著，约为 0.9。在我看来，这强调了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性。贫困率也在统计上显著并且稳健，参数估计约为 1，强调了贫困作为脱欧决定因素的重要性。而失业率的参数估计在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剔除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后，失业率并未发挥更多作用。
- 非英国出生人口占比不具有统计上稳健的影响。在估计只包含四个区域的虚拟变量（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和非英国出生人口占比的简单模型时，非英国出生人口占比估计参数为-0.45，显示移民占比越高，脱欧比率越低，原因或为移民通常流向经济更有活力的地区，那里年轻人和受良好教育的人比例更高、倾向于留欧。但在控制这些社会经济因素后，移民不具有额外的重大影响。
- 四个区域虚拟变量的参数都为负并在统计上显著。苏格兰的参数约为-20，北爱尔兰约为-15，威尔士约-6，伦敦约-10。显然，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地理和民族认同也在投票中起重要作用。

表 2：对投票参与率决定因素的回归估计

	Model E	Model F	Model G	Model H
Share of population aged 20-34	-0.62 [-10.0]	-0.48 [-8.0]		
Share of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0.47 [5.7]	0.44 [5.7]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 a degree	0.36 [8.5]		0.25 [5.3]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out qualification		-0.39 [-7.9]		-0.37 [-6.9]
Disposable income per inhabitant	-0.02 [-1.6]	0.01 [1.2]	-0.01 [-0.7]	0.00 [0.3]
Gini coefficient of income inequality	0.32 [2.1]	0.32 [2.1]	0.51 [2.9]	0.51 [3.1]
Poverty rate	-0.36 [-2.1]	-0.15 [-0.8]	-0.30 [-1.5]	-0.07 [-0.4]
Unemployment rate	-0.44 [-4.0]	-0.31 [-2.6]	-0.72 [-6.0]	-0.49 [-4.0]
Share of non-UK born population	-0.10 [-2.7]	-0.12 [-3.2]	-0.16 [-3.7]	-0.16 [-3.8]
Scotland	-5.47 [-9.6]	-5.09 [-8.7]	-5.88 [-9.0]	-5.41 [-8.6]
Northern Ireland	-8.04 [-6.9]	-6.66 [-5.6]	-7.76 [-5.7]	-6.46 [-5.0]
Wales	-1.02 [-1.4]	-0.38 [-0.5]	-1.82 [-2.2]	-1.23 [-1.6]
London	-2.78 [-1.8]	-2.27 [-1.4]	-3.08 [-1.7]	-3.00 [-1.7]
adjusted R2	0.82	0.81	0.75	0.78

来源：作者计算。

谁在投票？

我也估计了四个版本的回归方程，以研究投票参与率的决定因素（见表 2）。表 2 为理解投票参与倾向提供了有趣的视角：

- 常驻人口中年轻人占比高的地区投票率较低。因此，年轻人作为留欧的主要支持者，在投票中更倾向于弃权。相反，老年人（大部分是退欧支持者）参与投票的比例更高。
- 拥有学位者（也是留欧支持者）倾向于参与投票，而没有学位的人（退欧支持者）更倾向于弃权。此外，三项社会指标中不平等对投票率贡献为正，而贫困与失业的作用相反。上述结论表明，弱势群体的投票率更低。
-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投票率不具备统计上显著的影响。移民对投票率存在统计显著的负影响，尽管作用微弱。最后，即便控制社会经济变量后，投票率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强烈支持留欧的地区）也显著更低。

对包容性增长的启示

回归结果显示，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支持留欧的比例较高。由于英国的代际流动性较低，即父母穷困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态倾向于在子代延续，本文回归结果强调了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票者的社会经济背景。

存在清晰的地理特征表明，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支持留欧，强调了民族身份的作用。移民问题对公投结果的实际影响并不显著，而在控制部分社会经济特征后，人均家庭收入也没有太大影响。弱势群体和留欧意愿强烈地区的投票参与率较低：年轻人和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和伦敦居民参与投票的比例更低。

尽管投票结果支持英国脱欧，欧盟领导人或许能从公投结果中获得一些正面信息：将在未来成为人群主体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能理解欧盟整合利益）对欧盟更为重要。

本文的关键贡献之一在于，在控制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与退欧比例存在正相关性。这一结论呼吁更加包容性的增长模式，OECD 将之定义为“为各阶层群体创造机会、以货币与非货币形式平等共享经济繁荣好处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变量，而欧盟各国中英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几乎最高。英国新任首相 Theresa May 也高度强调了社会改革对降低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性。

总体上看，不平等和贫困降低了人的幸福感和社会和谐程度，激励了公投中的反对票。这是各国政治家们应从英国脱欧中学到的关键教训。

本文原题为“Brexit vote boosts case for inclusive growth”。本文作者为 ZSOLT DARVAS，Bruegel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 Bruegel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脱欧对于伦敦金融城的影响

Dirk Schoenmaker/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如果英国无法确保像挪威一样在不具有欧盟完全成员身份的情况下依然能与之自由贸易,而是将商业活动局限在内部市场,就将失去提供金融服务以及欧元结算的能力。而这两者都是伦敦作为金融中心最吸引人之处。多数大额银行业务以及交易部门将因此撤出英国。编译如下:

1. 欧盟经济区之外的伦敦金融城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其中一个的优势就是它能通向更广阔的欧盟经济区(EEA)。外国金融公司可以将英国许可证用作欧洲护照,从而在整个 EEA 提供金融服务。伦敦同时也是众多以欧元结算的交易通向欧元清算体系的大本营。如果英国无法确保像挪威一样在不具有欧盟完全成员身份的情况下留在 EEA,并依然能与之自由贸易,那么它将失去欧元清算体系的通行权。

本文中关于大客户金融和交易的发现具有启发意义。早前数据显示,伦敦银行系统的一半以上涉及对伦敦金融城内大客户的金融业务。它包括交易汇款和衍生品活动,并且以多种货币形式体现(美元,欧元和先令)。之后我们发现,店头交易(OTC)衍生品市场尤其会受到影响,因为 70%以欧元计价的场外利率衍生品是在伦敦进行买卖的。

2. 通行证

国内市场由规章制度组成的框架撑起。一个在其母国拥有许可证的公司可以通过护照的市场准入在其他 EEA 国家经营。为了搞清楚这个护照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将阐释护照如何通过资本要求指令(CRD IV)来合法工作。护照由几个 CRD IV 元素组成:许可证,建立子公司的自由权和母国监管。这个用一个母国发放的护照就能畅行无阻的体系只局限在 EEA 境内。因此,如果英国离开 EEA,由英国颁发许可证的银行就需要从 EEA 成员国手中再获得一个额外护照,以便在其境内开展业务。

一个额外的护照对所有跨境业务——即在他国建立子公司或者直接提供跨境服务——来说都是必须的。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将成为第三方国家。它将需要寻找一个 EEA 市场的入口。同样,EEA 金融机构进入英国也需要申请许可。

3. 基础设施

鉴于在英国开展的以欧元计价金融体量巨大,对于伦敦来说,能够直接获取大额支付(TARGET2)和欧元清算(LCH-Clearnet)的基础设施十分重要。

TARGET2,即欧元区的支付体系,允许国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 EEA 内指定

金融机构加入——即使它们不在欧元区。因此，就算英格兰银行不参与，英国的银行和其他指定金融机构也被允许成为 TARGET2 的直接参与者。

但是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不加入 EEA，那么英国的银行将不再是 TARGET2 的直接成员。它们只能通过 EEA 境内的子公司开展业务。这将使通过英国的欧元银行业务花费更多，同时也将损害伦敦作为非 EEA 银行欧盟总部基地选择的吸引力。

4. 大额银行业务

伦敦大额银行业务规模究竟有多大？数据显示，大部分英国银行资产由英国四大主要银行，即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和渣打银行持有。渣打业务主要在亚洲，而前三个则在欧洲活跃。汇丰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已经在欧陆建立附属银行，即拥有许可证。巴克莱则主要通过二级支行开展业务。因此在脱欧后只有巴克莱还需要在 EEA 境内获得额外的许可。估计英国主要银行 1/3 的总资产与他们在伦敦的交易和衍生品书有关，金额高达 1.18 万亿英镑。

同时，伦敦 1.73 万亿英镑的资产被主要国际投行持有。这些投行将伦敦视为它们欧洲业务的大本营。数据显示，90% 美国五大投行的欧洲雇员在伦敦工作。这些投行使用它们的英国护照在整个 EEA 境内开展业务。目前，它们也在寻求一个新的 EEA 认可的护照。

到底有多少衍生品和证券交易以及美国投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将转移到欧陆，现在依然只是猜测。早期预估最少是 20%。未来某个时期，特定市场的流动性将转移到欧陆，这也意味着部分交易场地也将转移。

此外，许多国际银行，包括主要欧洲银行，也在英国有大量支行。这些外国支行的大部分实际上与英国客户之间业务稀少。保守估计预测，2/3 的英国业务与大额银行业务有关。

5. 交易

对于脱欧对伦敦金融城影响的最后一步分析是对欧元计价交易的估计。伦敦的主要大额金融市场包括了衍生品，外汇交易，私募和公开债券交易，股权交易和商品交易。如果伦敦不再拥有欧元清算渠道，债券和衍生品市场将受到最大打击。首先，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而伦敦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外汇兑换交易的结算通过 CLS（最初的连续联结结算）开展，它是最大的多种货币现金结算体系，用来调和其成员银行外汇交易的风险。因此，它不依赖于伦敦是否能够进入 TARGET2 体系。其次，股权交易的结算与对应的股票买卖紧密相连，并在这一过程中操作。最后，大宗商品（如原油，金属）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用美元结算的。

BIS 做的关于外汇交易和衍生品市场活动的三年期央行调查数据显示，伦敦在所有欧元结算贸易中占到约 70%，这与纽约在美元结算贸易中占比相似。这么大的占比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市场分别是欧元和美元衍生品市场中最具流动性的，因此吸引了各自货币中的绝大部分业务。另外，50%的全球场外利率衍生品市场与欧元结算的衍生品有关，这无疑是最大的市场。这些数据显示，第一，目前伦敦金融城是欧元结算利率衍生品主要市场的大本营。第二，伦敦在欧元结算交易中的占比是全球利率衍生品市场的 1/3。第三，脱欧后，伦敦金融城内利率衍生品市场的 69%可能转移到欧陆。

债券交易中心化程度不高，主要通过各自具有结算体制的不同平台进行，因此没有一个中心市场。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两个指标建立起它的基本情况：债务总额和完成交易。调查显示，伦敦在私募债券市场上的地位不如在衍生品市场。英国在欧元结算的私募债券上占比大约 16%，德法分别为 21%和 14%。此外，在公司债券部分，德（27%）法（22%）比英国（11%）占比更大。在政府债券方面，伦敦清算所为欧元区大部分政府债券服务。但是近来法国已经超越英国，部分是因为来自南欧的欧元政府债券增加。

总之，伦敦金融城在欧元结算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但是它可能在脱欧后失去这一优势。而它在债券交易中的地位与法德基本持平。

本文原题为“Lost passports: a guide to the Brexit fallout for the City of London”。本文作者 Dirk Schoemaker 为 Bruegel 的高级顾问，同时也是鹿特丹大学管理学院银行和金融学教授。本文于 2016 年 6 月刊于 Brueg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会影响 TTIP 谈判，但是也有积极影响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文 侯书漪/编译

导读：英国脱欧会放缓跨大西洋贸易协定的进程，但在另一方面，除去了英国的影响，也可能为美国-欧盟的贸易协定谈判带来一些好处。编译如下：

英国脱欧将放缓跨大西洋贸易协定的进程，但同时也会消除一些英国所带来的症结。

随着英国的脱欧，被不确定性笼罩着的美国 -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提议（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或 TTIP）变得更加前途未卜。谈判在三年前正式启动，但随后因为大西洋两岸的差异（例如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政府采购等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公众反对而陷入僵局。目前，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有决心在 7 月 11 日至 15 日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上渡过难关、继续谈判。

英国的脱欧全民公决的结果会从三个方面影响到 TTIP 的谈判者。首先，英国脱欧公投将推迟 TTIP 会谈，因为欧盟官员会将他们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集中于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一旦英国政府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双方都有两年的时间去梳理分离程序。欧盟会一直聚焦于自身，直到它与英国的关系变得十分清晰。TTIP 谈判在此期间很可能会继续，但这件事不会是欧盟的重点。

第二，关于 TTIP 的任何进展都需要双方明确他们的谈判内容。但在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最终性质明确之前，美国人很难准确估计拥有剩余的欧盟市场所带来的价值。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知道让步会得到什么好处，美国谈判代表就未必会提供最好的条件。

第三，随着英国公投离开欧盟，TTIP 失去了其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法国和德国的官员越来越多地表达着对 TTIP 的担忧。在英国脱欧投票后的三天内，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否认了美国 - 欧盟贸易协议的可能性，称 TTIP 有悖于“欧盟利益”。此外，根据最新的欧洲晴雨表调查，59%的德国人反对 TTIP，而之前数据为 51%。英国呼吁进一步贸易自由化的声音只会被急于达成交易的美国谈判代表重视。

尽管英国脱欧在 TTIP 的地平线上笼罩了阴云，仍然有着一线希望。英国脱欧的决定可能从两个方面为美国 - 欧盟贸易谈判带来一些好处。首先，金融服务监管可能不再是 TTIP 谈判的症结所在。鉴于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曾坚持在协议中加入金融服务的内容。但美国一直抵制这一点。这种分歧的去除了有助于 TTIP 谈判的进行。

其次，欧洲的贸易谈判将不再需要考虑英国担心 TTIP 会威胁国民健康服务（NHS）的问题。在英国，许多关于 TTIP 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交易可能如何影

响 NHS。TTIP 的反对者认为，在该协议中加入医疗保健可能会导致私有化和 NHS 的最终消亡。欧盟贸易专员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Cecilia Malmström）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纠正这些误解。英国退出欧盟意味着她现在可以专注于解决关于 TTIP 的其它困扰，而这有可能有助于推动贸易协议。

现在和不久的将来，英国仍将是欧盟的成员，欧洲委员会将继续代表所有 28 个成员国的谈判贸易协议。尽管英国脱欧，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仍然会尽力推进贸易协议。英国离开欧盟的决定尚未削弱 TTIP 的情况。在谈到欧盟的公投后果时，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说：“TTIP 的经济和战略基础依然强劲。”而同样职位的塞西莉亚·马姆斯特罗姆（Cecilia Malmström）更进一步，她说英国决定离开欧盟为在今年完成 TTIP 谈判创造了更多的动力。

虽然这个时间安排不太可能完成，TTIP 协议在英国决定脱欧后仍有可能达成。然而，英国脱欧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将可能将 TTIP 的完成推后至少两年。任何交易都需要考虑到未来的英国 - 欧盟的贸易协议的性质，而这在 2018 年之前可能难以得知。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的选举（两个国家的公众强烈地反对 TTIP）将在 2017 年举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由于下一届政府的贸易政策仍然不明，美国总统大选又为此增加了一层的不确定性。当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代表本周再度见面时，他们不应该太担心英国的脱欧风暴，而是在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可能会波及 TTIP 的政坛风云变化。

本文原题为“Brexit Clouds TTIP Negotiations But May Not Scupper Deal”。本文作者 Marianne Schneider-Petsinger 为美国和美洲计划的地缘经济学研究员。本文于 2016 年 7 月刊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南中国海现在将实现和平了吗？

Bill Hayton/文 张麟/编译

导读：2016年7月14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南中国海现在将实现和平了吗？》，作者就南海仲裁案公布结果之后的亚太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由海牙国际法院五名法官组成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是简单的、具有灾难性的。裁决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九段线”范围内的海洋区域主张历史性权利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样的结果是东南亚海洋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解决该地区所有争端的途径现已明了，如果争端各方选择这样做的话。

近几十年来，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都生活在一种没有人真正理解的准领土主张的阴影下。中国地图上标注的U型九段线究竟是什么意思？在2009年，中国政府在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官方材料的时候附加了一份地图的复制品，这使该地区各国开始提高警惕。似乎中国第一次打算严肃的明确主张对九段线以内的所有领土和领海的权利。

在7月12日，上述这种主张被认为是与国际法完全相悖的。而且，仲裁庭认定南沙群岛中没有任何一个岛屿有资格称为岛。这项裁决至少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南沙群岛的各项属性中没有一项有产生专属经济区的权利。理论上讲，现在解决南中国海南部所有的海洋争端应该是简单明了的。原则上，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可以从他们各自的海岸线出发向外划200海里，并可以在他们重合的地方达成妥协。而中国现在与这样的进程无关，因为它最近的海岸线都距此十分遥远。

南沙群岛所有约50个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能够产生12海里的领海。由此产生的解决方式将会像一个瑞士奶酪：从国家海岸线算起的大范围的专属经济区被一些争议领土的泡沫所点缀。关于哪个国家是那些泡沫的合法所有者的问题将无法解决，但围绕这些泡沫周围的海洋争端可以得到解决。

当然，障碍依然存在。尤其是菲律宾对马来西亚的北婆罗洲省的沙巴地区提出主权要求。这表示，目前两国的海洋边界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尽管如此，两国却能在从海岸线向外延伸多远这样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更大的麻烦将来自中国的态度。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做出了愤怒的回应。国家主流媒体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尽管仲裁庭被禁止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几乎完全不受7月12日的裁决影响。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另外的程序。

中国在南中国海域有诸多利益——包括防务、商贸航线、渔业资源和油气资源——所以中国采用任何它认为能够切实可行保护这些利益的手段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根本目标就是创设出一种国际秩序来保卫各个国家开发利用其海洋资源的权利，进而使这种权利不受其他国家的威胁侵害。中国参加了从 1973 年到 1982 年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历次谈判，在那时，中国是沿岸国家权利的坚定的捍卫者。

尽管中国可能会觉得它输掉了这次的仲裁，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一个有力的地区秩序共同体方面仍有重大利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然对中国的意图保持着警惕——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过去一些年里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并增加军费开支。目前这种紧张态势的逐步缓解是有利于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的。重新使邻邦们安心将使它们有更少的理由去依赖美国。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构建一个新的、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海洋秩序将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这也将带来许多附加好处——尤其是合作保护该地区面临灾难性捕捞的渔业资源。而第一步就是要接受仲裁庭所做的裁决及其带来的影响。

本文原题为“Will There Now Be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本文作者为英国智库 Chatham House 亚洲研究专家 Bill Hayton。本文刊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

The Rt Hon Lord Williams of Baglan/文 张麟/编译

导读：2016年4月13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作者对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形势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相关知识。编译如下：

尽管最终结果在年底之前可能还不能确定，但竞选成为下一任秘书长的活动正在进行中。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将在12月31日结束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是联合国的“首席行政长官”，类似于英国政府中的常务秘书的角色，这也是该职位的原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秘书长的职责更重要。正如每一个九月份来纽约的人所知道的那样，联合国秘书长是国际外交的核心。联合国大会会在当月召开年会，届时，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长和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都将出席，包括美国总统。这会使得曼哈顿中心区的交通陷入瘫痪。

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将会是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的第九位秘书长。在理论上，《联合国宪章》将决定权给了联合国大会，但该宪章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们精心制定的，所以联合国大会的决定要以安理会提名的候选人为基础。尽管后者成员的数量已经从一开始的11国增长到了15国，但它仍然被把持在1945年的战胜国手中，即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这一次的竞选至少在程序上更加公开了，有竞选者发表的公开声明，公布其个人介绍并参加由联合国大会主持的竞选演说。在其新变化中甚至有提议说安理会可能会向联合国大会提名两个候选人。然而，竞选程序到了最后仍然由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紧密控制的。一个得不到大国支持的竞选者将会一事无成。

按惯例，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选择上会实行地区轮换制，尽管明显有三任，特里格夫·赖伊（1946-52）、达格·哈马舍尔德（1953-61）和库尔特·瓦尔德海姆（1972-1981）都是欧洲人。也曾有两任亚洲秘书长，吴丹（1961-71）和潘基文（2006-），和两任非洲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1992-96）和科菲·安南（1997-2006）。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982-92）。唯一一个没有成功提名一位秘书长候选人的地区组是东欧。因此，许多已被公布的候选人和可能公布的候选人来自东欧是不足为奇的。

已宣布的候选人中最著名的是伊琳娜·博科娃，曾任保加利亚前外交部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她长期居住在法国首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而历史上保加利亚与俄罗斯长期保持密切关系的事实使她处于有利地位。她已获得了其他几个东欧人的加入：Igor Luksic，黑山外交部长；Vesna Pusic，克罗地亚前外交部长；Natalia Gherman，摩尔多瓦前外交部长；Srgjan Kerim，马其顿前外交部长和 Danilo Turk，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他过去曾参加竞选但失败。

还有谣言称另一位东欧候选人在幕后准备，即曾主管人道主义援助的克里斯塔莉娜·乔治艾娃，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来自该区域之外的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葡萄牙前总理，最近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他也已公布了他的候选人身份。他对该组织的得力领导和全球难民问题的突出增强了他的竞选地位。

许多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东欧如此重视这个职位感到不满。他们指出尽管东欧在冷战时是一个可单独识别的地区，但现在所有的东欧国家都已加入欧盟和北约，或是成为其联系国，所以东欧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地区。得到更广泛认同的是许多成员国认为在 70 年之后是时候出一位女联合国秘书长了。事实上这是英国人的立场。上周，海伦·克拉克，新西兰前总理，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公布了她的候选人身份。另一位被澳新普遍认为有兴趣，可能宣布其候选人资格的是澳大利亚前总理凯文·拉德。

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正好与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重合。在意识到这个职位迄今为止一直是由男性把持的情况后，奥巴马很可能会支持一个女候选人。如果那位女性来自保加利亚的话，那将很可能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并得到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同意。

本文原题为 “The Next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本文作者为英国智库 Chatham House 访问学者 The Rt Hon Lord Williams of Baglan。本文刊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英国脱欧将会削弱英国应对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的能力

Benoit Gomis/文 张麟/编译

导读：2016年5月16日英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文章《英国脱欧将会削弱英国应对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的能力》，本文针对当前出现的英国退出欧盟思潮可能在安全和防务方面带来的影响作了明确的分析。编译如下：

对欧盟在安全上提出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欧盟内部的边界开放政策使得各国难以打击犯罪，对恐怖主义分子、金融资产和武器的流动进行监控。各个成员国的警察和情报系统之间缺少信息的交流，这阻碍了有效地预防和执法。政治上的分歧意味着欧盟国家经常达成的是最低限度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欧盟的机构也没能解决某些腐败、幻灭、愤怒、歧视等其他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正是恐怖组织可以利用的。

但是，如今欧盟所能提供和承诺的要远远多于其弊端，这有四大原因。

第一，欧洲仍然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区。在近期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袭击发生之后，欧洲在应对恐怖主义上的漏洞明显得到了足够的关注。2015年11月在巴黎的袭击和2016年3月在布鲁塞尔的爆炸是迄今为止两国历史上造成伤亡最多的事件。在法国，恐怖袭击从1970年到2014年共造成了265人死亡，但在2015年11月13日的袭击中，只在一夕之间就造成了130人的死亡。在比利时，从1970年到2014年只有40人因恐怖袭击死亡，而布鲁塞尔在3月22日一天就有32人死亡。

然而，在全球背景下看，欧洲还远没有到虚弱的地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恐怖袭击都发生在欧洲联盟之外的一小部分国家中。在2014年，在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发生了25500件死亡事件，占国际总数的78%。相比而言，在1970年和2014年间，只有不到15500次恐怖袭击发生在28个欧洲国家中，70.5%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死亡超过10人的只有36起。欧洲的恐怖活动在八十年代以后也在频率和破坏性上有所下降，从2000年到2014年只有2227次袭击，而其中95%的袭击都没有出现死亡事件。

第二，欧洲联盟自身极大地促进了大陆上的和平与安全。尽管大家都知道恐怖主义的形成并没有一定之规，但绝大部分的恐怖袭击都发生在那些治理能力弱、冲突旷日持久、政治高度腐败或社会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国家，而这些威胁正是欧盟正努力在其内部和周边所积极应对的。

第三，国际安全挑战要求一种协调应对。鉴于我们经济上的全球化状态，包括走私军火、洗钱和毒品贸易在内的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天然都是跨国的。为了起到最佳的效果，因而政策应对也该是跨国的。英国退出欧盟将使英国与其欧

洲的执法和情报伙伴之间的合作更为困难。如果英国离开欧盟，英国将需与欧盟的机构及其成员国签订大量的新双边协定。

在欧盟成员国之外，英国也将要重振与看重其现有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国际伙伴之间的协作。正如在 4 月 22 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指出的那样，美国在贸易上将优先与一个大集团谈判，而非逐个签约。在跨国安全威胁议题上，美国仍将坚持同样的原则。

第四，身处欧盟之外，英国将不再能依靠欧洲的政策工具来打击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这包括欧洲刑警组织——作为一个跨境犯罪的信息交流和调查中心被证明越来越有用，而且新设立的欧洲反恐中心将作为全欧情报和技术交换的一个重要枢纽而发挥作用。没有欧洲逮捕令，英国将需要与欧盟成员国处理更复杂繁琐的引渡程序才能起诉涉嫌严重犯罪的人或确保那些被判有重罪的人能够服刑。

一旦离开欧盟，英国将失去很多其他的重要工具，像欧洲检察官组织，欧盟中负责促进司法事务合作的机构；培训全欧盟执法人员的欧洲警察学院；欧洲反欺诈办公室以及其他很多有用的机构，平等的培训平台，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机制。最终，英国在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就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领域进行合作的能力将会被严重削弱。

这些工具中没有一个使英国免于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因为这些威胁不能完全根除，他们只能被管控和缓解。但是，留在欧盟会给这个国家最有利的机遇去有效的管理和减少这些威胁。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欧洲仍然是一个和平安全的地区。欧盟针对它所有的弱点进行完善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安全网络，这是有益于英国的，能使英国在整合急需资源的时候保持伸缩性和高效率。分裂和削弱这一安全基础设施将是轻率的、错误的。

本文原题为“Brexit Would Impair Britain’s Ability to Tackle Terrorism and Organized Crime”。本文作者为英国智库 Chatham House 国际安全专家 Benoit Gomis。本文刊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 Chatham Hous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4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8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2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6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